目　录

序 …… 商金林 (1)

绪　论 …… (1)

第一章　“新文学选集”的出版 …… (23)
第一节　作为“纪程碑”的“新文学选集” …… (25)
一、从“现代作家文丛”到“新文学选集” …… (25)
二、传播“新文学史知识” …… (28)
第二节　编选方式的“组织化” …… (35)
一、人选、选目及序言 …… (35)
二、《田汉选集》和《瞿秋白选集》的缺席 …… (44)
第三节　赵树理的“越界” …… (48)

第二章　人文版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 …… (59)
第一节　对“新文学选集”的拓展 …… (59)
一、开明书店的解体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成立 …… (59)
二、“协调”现代作家选集的人选 …… (66)
第二节　文艺政策的调整对现代作家选集的影响 …… (73)
一、第二次文代会与编选范围的扩大 …… (73)
二、“双百方针”与“逆流”作家的“回收” …… (81)

第三章　序言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 (97)
第一节　自我检讨与自我重塑 …… (97)
一、“跨到新的时代来” …… (97)
二、“挖去创作思想的脓疮” …… (111)
第二节　指点思想改造的“路径” …… (126)
一、从“书生”到“战士” …… (126)
二、为革命文学提供规则 …… (139)

第四章　对旧作的“整理”和“改造” …… (146)
第一节　篇目上的过滤 …… (146)
一、重新选定“代表作” …… (146)
二、时代标准制约下的选目 …… (160)
第二节　在文本上“精益求精” …… (177)
一、实行严格的“三审制” …… (177)
二、“好的修改也就是创作” …… (187)

第五章　修改与批评 …… (201)
第一节　语言的规范化与大众化 …… (201)
第二节　主题思想的变异 …… (211)
一、确立新的人物等级序列 …… (212)
二、对革命者的“纯化” …… (221)
第三节　修改背后的批评 …… (232)

结　语 …… (245)

附录一　新华书店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书目 …… (248)
附录二　人文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书目 …… (251)

附录三　上海春明书店版“现代作家文丛”书目 …… (253)
附录四　开明版“新文学选集”书目 …… (254)
附录五　1952—1957 **年人文版现代作家选集书目** …… (256)
附录六　开明版“新文学选集”目录 …… (258)

主要参考文献 …… (269)

后　记 …… (276)

序

商 金 林

“五四”新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命运如何？五十年代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究竟怎样？这是每个关心五十年代文学的人必然要思考的一个课题。近年来，学术界基本上摒弃了八十年代喧腾一时的“断裂”论，认为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结”，五十年代的文学是对“五四”新文学的“延续”。但对这种“联结”和“延续”的考察大多局限在创作领域，对文学史层面的考察关注得不够。五十年代是否出版“五四”新文学作品，出版了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以什么样的规格什么样的方式出版这些作品，“五四”新文学作品的出版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新中国文学的建构和对传统的打造都有哪些关联，党的文艺政策和对知识分子改造以及统战工作与“五四”新文学作品的出版都有哪些内在的联系，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文学史研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然而却很少有人触摸过。陈改玲的博士论文《重建新文学史秩序——1950—1957 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研究》，以 1950—1957 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作为研究对象，从“出版”以及“出版了什么”和“如何出版”等层面进入，对“五四”新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命运，以及五十年代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进行透视和阐释，这一“偏僻”而厚重的选题及其独到的学术思路，对于现代作家以及“五四”新文学和五十年代的研究，都具

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五十年代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重塑“经典”，打造“传统”。出于新中国意识形态和学术形态的需要，五十年代形成了全新的新文学史观，即以现实主义为主流，以左翼作家为主体。在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过程中，必须坚守这一“新文学史观”的原则。选择哪些作家及哪些作品出版，都与党的文艺政策、与“统一战线思想”、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密不可分。当然，广义上的“五十年代”也是一个“漫长”的历程，新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党的文艺政策也处在一个不断在“变”的状态中，从而使得“五十年代”对与“主流”和“主体”相对应的那些非左翼作家、非现实主义的作家作品的处置，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形态。近年来，一些学者出于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同情，往往会夸大历史的“断裂”，认为五十年代是一个完全排除非左翼和非现实主义的时代，为沈从文等作家鸣不平。其实，五十年代出于种种考虑，“主流意识形态”也在一定程度上顾及到了非“左翼”作家的非“主流”的作品，例如沈从文，以及戴望舒、废名等人的选集也得以出版。这些作家选集的出版，既表明了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依归”，也使我们看到了五十年代确有某种不同的文学的改造与组合。总之，五十年代是纷繁复杂的年代。对这个纷繁复杂年代的研究切忌简单化和片面性。

陈改玲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已在高校任教多年，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和较强的学术敏感。她身上洋溢着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精神，对于学术有一种充沛的激情和神圣感。她选取这个选题，也就意味着必须走“求真”“务实”的路，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对于五十年代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研究，如果没有甘坐冷

板凳的精神，花“笨”气力在史料堆里摸打滚爬，是不可能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史”的脉络的，也只有把“史”的脉络梳理清楚了才能提出问题，或者说才能提出学术界已经触及到而没有说清楚甚至是说“偏”了说“过”了的问题。虽说“有一份材料未必就能出一份货”，这中间还有“胆识”和“才学”这两大支柱，但“没有材料就不出货”是千真万确的。陈改玲在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营造的重视史料、尊重史实的学术氛围中，潜心读书。在广泛搜集阅读五十年代出版的书刊和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选择了开明书店的“新文学选集”，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现代作家选集的文本和出版过程作为主要论述对象，通过对出版方式的变更、作家对于自身作品的叙说、篇目的确定、文本的修改，以及文学史家们的评述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较系统而深刻地展示出五十年代现代作家选集出版的意义，从中揭示了主流意识形态重塑传统、规范当今的动因与特质，从而拓宽了文学史的研究。在论述过程中，陈改玲注重突出“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如从“民族国家”的创建的角度来阐释五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和作家的选择，超越了“压抑/反抗”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于作家和文本的解读，以及相关理论的阐释和某一现象复杂性的分析等都提供了许多新颖的见解。

被誉为“新文学的纪程碑”的“新文学选集”，是新中国第一套汇集“五四”以来作家选集的丛书，由茅盾主编，文化部“新文学选集编委会”编选，由开明书店出版。陈改玲在研读“新文学选集”时，不仅把历来为研究者所忽视的地方一一“读”了出来，而且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给人以忽然顿悟、耳目一新之感，掩卷三思，惟有信服。如“新文学选集”的扉页和封底衬页的正中都印有鲁迅与毛泽东的大幅的头像，研究者从未留意过，可陈改玲

独具慧心，将“新文学选集”的这个构想，与第一次文代会的会场主席台上高挂着的由六面红旗装饰着的毛主席和鲁迅的侧面像联系起来，指出这是一种政治象征，即突出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权威地位——鲁迅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又表征着中国共产党对“五四”新文学的领导权，形象地诠释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文化运动的经典论述。不仅把毛泽东描述为 1942 年以后的解放区文学的“导师”，而且意味着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发展的最终方向，就是走向 1942 年以后的文学上的“毛泽东时代”，从鲁迅到毛泽东，这是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文学选集”原定出二十四种，可结果只出了二十二种，《瞿秋白选集》和《田汉选集》未能出版。尽管“新文学选集”所刊登的广告中都标有《瞿秋白选集》和《田汉选集》“在排印中”的字样，可最终都不了了之，个中原委从未有人追究过。陈改玲经过细心地考辨，指出《瞿秋白选集》未能出版，原因之一是他的文艺论文中有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抵牾的话语。而《田汉选集》为何未能出版呢？陈改玲在论文中援引了事隔三四年之后，即 1955 年田汉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写的《〈田汉剧作选〉后记》，从这《后记》推定田汉是出自一种“惶恐”心理，以全新的标准衡量“旧作”，总担心“拿不出去”，以致放弃了这份“光荣”。这其实也是当年作家们共同的心态。“新文学选集”在当时有相当大的权威性，陈改玲将此认定为是“政府的行为”，是一种“示范”，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近年来，赵树理入选“新文学选集”一事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新文学选集”在编选范围上特意和周扬主编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加以区分，主要收录“1942 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

问世”的作家的作品。而赵树理是解放区作家，他的小说都写于 1942 年之后，而且都已入选“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按说是没有资格和理由入选“新文学选集”的。可赵树理就是堂而皇之地“越界”，“赵树理现象”该如何解释呢？陈改玲在论文中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建国前后赵树理的作品相当畅销，“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必须倾听“新中国主人公”的呼声；二是要纠正当时一部分读者把“五四”新文学与解放区文学对立起来的种种“误解”；三是要凸显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是在‘五四’的战斗的、革命的文学传统中发展起来的”思想，强调“新文学选集”就代表了“五四”新文学的战斗的、革命的文学成果。这些独到的阐释远比当今学术界流行的“新政权意图把赵树理经典化”的“言说”要丰富得多。

相对于当今学术界风行的“洋洋洒洒”的理论，陈改玲的这篇论文以“史料”见长，我尤其欣赏她对版本的考辨。作家作品的选择和修改，是我国现代文学解放后“生存、发展”的一种形态，也是新时代的经典生成的特殊需要。这种选择和修改对于“语言规范化”和艺术某些方面的“成熟”也会有所帮助，但它掩盖了现代文学史真实的图景。为了还原历史，陈改玲花大气力做版本的校勘比对工作，发现了许许多多重要的“删改”，这对于重写文学史不无启示意义。闻一多的《最后一次的讲演》，是生命与血所谱就的壮丽篇章，因为闻一多在做完演讲的当天傍晚，就被反动派枪杀于昆明街头，他是划时代的死者。可李广田对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的“删改”一事，却从未有人提及过。李广田在选编“新文学选集”中的《闻一多选集》时，删去了闻一多把中国和平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的“开明舆论”和“美国人民”的身上，以及赞扬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文字。李广田的

删改与毛泽东在1949年8月18日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有关。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认为:“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的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把闻一多作为“民族脊梁”、中华民族抗击美帝国主义的英雄来讴歌的,他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对照毛泽东的论述,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的一些段落,正是毛泽东所要批评的那种没有认清美国帝国主义本质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知识分子的“糊涂思想”,这与“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的赞誉,自相矛盾。为了弘扬闻一多“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把闻一多塑造为“学习《整风文件》”、追随共产党奋进的斗士形象,李广田对此做了删改。陈改玲的这个“发现”,对闻一多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当然,对“已故”作家作品的“删改”,不只是闻一多,鲁迅、蒋光慈、殷夫等人的作品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动。至于“健在的”作家出自自我改造的真诚,在《序言》中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选目”反反复复地筛选、对旧作进行认真的“整理”与“改造”的例子,就更多了。研究者往往一味感叹和怜悯这些作家的“愚忠”,而陈改玲却能够把这一切放在一个大的历史时期,放在“民族国家”创建的大视野下来审视,设身处地、尊重历史,从而得出了一些合乎情理的判断。指出现代作家选集出版

是由时代、作家与读者共同造成的，虽说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却为我们回顾历史留下了可以“反思”的话题。

陈改玲的博士论文即将付梓，作为她的指导老师，我的喜悦难以言说。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导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我之所以引导和鼓励陈改玲选择这一研究课题，不仅是为了确保她能拿到“一纸文凭”，而是想要帮助她确定一个可持续开发的研究领域，走出北大后继续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进一步地加以充实、扩张，并加强理论思辨的正面阐述与概括，使现代作家作品的出版研究富有更宏观的把握与对照的深广背景。陈改玲善于与老师和同学交流，乐于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喜欢学术对话和讨论。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主席孙玉石教授说：“陈改玲身上最令人感动的是那股竭力要把论文写好的努力精神。”的确如此，我由衷地希望陈改玲能把孙玉石教授表扬的这股精神发扬光大，在学术园地勤奋耕耘，有所作为。

2005 年 10 月 26 日于北大畅春园寓室

绪　论

五十年代是一个大的文化转型期，也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1949 年 7 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标明了现代文学创作的终结，中国文学进入了“当代文学”创作时段。为了总结现代文学的成就，也为了催促当代文学的发展，出版界主要从现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作品的出版入手，总结、整理、展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成绩，为新中国文学提供资源。但是，与现代文学史研究形成强烈偏差的是，学术界对五十年代现代文学作品出版研究关注得不够，近年来，出版了个别版本研究的专著，如金宏宇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①，也有一些零星的单篇论文的出现，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能触摸基本的出版史料，更谈不上做系统的研究了。本书拟在这方面做一点初步的尝试，以 1951—1952 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以及 1952—195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作家选集”为对象，探寻五十年代现代文学作品的出版与文艺政策、学术研究、经典确立、打造现代文学传统等诸多方面的联系，为现代作家与文学史研究展示特定时期长景式的全貌。

① 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

一

五十年代，现代文学被分为两大块：解放区文学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或者解放区以外以前的文学）。这两大块作品的出版，都直接受制于主流意识形态对其与新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理解。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解放区文学在四十年代末就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1948 年初，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政治上取得的绝对优势，共产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解放区文艺，传播新思想、新生活，并“对市民阶层进行思想消毒和教育工作”①，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的出版。这套丛书由周扬主编，最早由柯仲平、陈涌负责编辑，后来康濯、赵树理和欧阳山也都参加编辑工作。1948 年 12 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由新华书店开始陆续出版，至 1949 年共出版了《白毛女》《王秀鸾》《李国瑞》《刘胡兰》等共五十八种。丛书编选的宗旨和原则如下：

一、本丛书定名为“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暂先选编解放区历年来，特别是 1942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各种优秀的与较好的文艺作品，给广大读者与一切关心新中国文艺前途的人们以阅读和研究的方便。

二、编辑标准，以每篇作品政治性与艺术性结合，内容与形式统一的程度来决定，特别重视被广大群众欢迎并对他们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作者包括文艺工作者及一部分工农兵群众与一般干

① 茅盾：《关于目前文艺写作的几个问题》，《进步青年》（原名《中学生》）创刊号，1949 年 5 月 4 日。

部,作品的体裁包括戏剧、通讯、小说、诗歌、说书词及其它一切文艺创作。

四、作品按体裁分编。同一体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题和它所表现的革命时期的先后,分别排列,有时也照顾到地方的特点。同一作者同一体裁的作品达到一定数量时,则编成专集,长篇作品均单独印行。①

作为"解放区近年来文艺作品的选集"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是"实践了毛泽东文艺方向的结果"②。编辑标准自然遵循 1942 年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中确立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政治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文艺评审原则,同时也宣传了解放区的文学观念。在解放区,读者的身份是"人民群众",作品的"教育作用"被置于首位,作家是共产党的"文艺工作者",当然也有工农兵群众与一般干部。与作家身份的多样性相对应,解放区文艺作品体裁上也丰富多彩,"包括戏剧、通讯、小说、诗歌、说书词及其它一切文艺创作";同一体裁的作品"大致按作品的主题和它所表现的革命时期的先后,分别排列,有时也照顾到地方的特点",这种突出主题和时代、淡化地方特点的分类方法,便于读者从整体上了解解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表明解放区生活属于同一历史形态,只有"革命时期的先后",没有地区上的差异,预示着新中国文学和生活的整一化趋势。

民族国家、新的意识形态和新中国文学的建立是同步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是作为新中国文学的样板出版的,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文学的想象和规范。1949 年 7 月,标志着

---

①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编辑例言》。

② "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广告,刊登于《人民文学》第 1 卷第 2 期封四,1949 年 10 月 25 日。

新中国文学起始的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有幸参加文代会的代表们收到了解放军入城后的一份“厚礼”——一套“中国人民文艺丛书”①。在这次大会上,周扬做了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②的报告,他指出解放区文学是“新的人民的文艺”,新中国文学将直接汲取解放区文学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发展。并把新文学的发展过程描述为带有明确目的性、向“文艺新方向”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那就是从“五四”新文学到解放区文学到新中国文学。周扬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为对象,分析了解放区文学的“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等特点。指出“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而“新的人民的文艺”就是歌颂的文艺。他列出《高干大》《种谷记》《王秀鸾》《炮弹是怎样造成的》等一长串作品,它们“反映了中国人民如何在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各式各样的斗争中,克服了困难,改造了自己,产生了各种英雄模范人物”。周扬说:“对于他们,这些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人,我们除了以全副的热情去歌颂去表扬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表示呢?”周扬还具体指出了描写英雄模范人物的两种方法,一是写真人真

---

① 因故未能出席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也都得到了一套“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张明明在《雪中炭》一文中说:父亲张恨水在 1949 年春天因脑溢血半身不遂,“周恩来总理派人来看望父亲,邀请他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议’。得知父亲生病的情况后,政府对我家的生活做了妥善安排……”;“父亲因病没能出席‘文代会’,大会派人送来一套五十几册的《大众文艺丛书》,这些书都是全新的内容,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包括《白毛女》《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赵一曼》《三里湾》《王贵与李香香》等”。(引文均见《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年。这里的《大众文艺丛书》应该为“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赵树理的《三里湾》于 1955 年 5 月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初版,并未收录在这套丛书中。

②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 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

事，再一是写落后人物转变，认为这样写出的人物“是特别具有教育意义的”。而解放区文学在形式上则有两大特色，其一是在语言上“做到了相当大众化的程度”，其二是“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周扬声称解放区文艺的上述贡献，必将给新中国未来的文学灌注“新的血液，新的生命”。

建国后，“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继续增选优秀的解放区作品，1950 年编选新的文学作品《火光在前》《战斗里成长》《赵巧儿》等十种，修订或经校阅重印的文艺作品有《红旗歌》《李有才板话》《高干大》等十六种。1951 年国家级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一些优秀的作品被重排印刷，自 1952 年到 195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出版《货郎担》（秧歌剧），《刘胡兰》《种谷记》等二十一种。1952 年 4 月重排印刷的《吕梁英雄传》，到 1953 年 8 月已经是第五次印刷，总印数达 169000 册。解放区文学备受主流意识形态的青睐而被确定为新中国文学的典范，但是，为了繁荣新中国文学的发展，早日实现“文化建设的高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文艺界、出版界领导人在标举解放区文学的同时，还把目光转向解放区以外的“五四”新文学或者更为久远的民族文学传统，大规模地整理出版了解放区以外的文学作品。

二

1949 年春，各民主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接受共产党的邀请，绕道香港，陆续来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与会代表展望了新中国的宏伟前景，他充满豪情地说：建国后，“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

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这是一个激励人心的预言。这个预言等于给文艺界下达了一个任务。在五十年代,随着国民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对“文化建设的高潮”的渴求,成为新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文艺界、出版界、教育界等所有文化生产部门各尽其职,各显其能,它们积极制定发展计划,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共同营造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文化新局面。

为了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的早日到来,文艺界紧抓作家培养这一环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而“五四”新文学作品与新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关联正是通过作家培养来建立的。在党和文艺界领导人看来,文艺高潮的标志就在于出现大的作家。1959 年周扬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什么叫做文化高潮,也得和外国和古代比较,没有大作家、大科学家很难叫做文化高潮。”建国初,为帮助老作家尽快熟悉新生活,国家安排他们下乡、进工厂,到抗美援朝前线体验生活,收集素材。与此同时,新政权更重视对新作家(即新生力量)的培养,除成立了专门培养作家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外,《文艺报》设有通信员专栏,培养工农兵作者,扩大作家队伍来源。1954 年,中国作家协会创办了《文艺学习》杂志,主要普及文学知识和写作技巧,发刊词说它是“专为青年人创办的学习文学的刊物”。在报社和出版社这些生产作家的常规基地,编辑们更是费尽心力地引导、帮助作者。五十年代的文学编辑不仅引导作者提升主题,设置情节,还为作者修改稿子。五十年代中期,各地作协纷纷聘请老作家,以传帮带的方式,手把手教年轻人写作。一些大学的中文系也担负起培养作家的任务。为了促进青年作者的创作,1956 年 3 月中国作家协会和团中央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习作者会议,分析总结青年人作品的成绩与不足之处。

1957 年,著名出版家叶圣陶在总结建国以来的出版工作时说:“通过文学书籍的出版工作来鼓舞青年作者,也是我国出版工作者努力的一个方面。”①为了鼓励青年作家的创作,也为了展现新中国文学创作的成果,出版社为青年作品的出版大开方便之门。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例,从建社开始,除了“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之外,还着手出版“文艺建设丛书”,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理论等各种体裁作品如《铜墙铁壁》《从延安到北京》《开不败的花朵》等共十九种。“文艺建设丛书”由丁玲、田间、陈企霞、康濯、萧殷五人组成的“文艺建设丛书编辑编委会”编选,由丁玲负责。《文艺报》因为性质与篇幅的限制,不能经常多登各种文艺作品,但在编辑过程中,由于经常和各方面作者有所联系,接触了一些文艺作品方面的稿件。为了对作者与读者在作品出版与读物供应两方面尽一些力量,《文艺报》社决定扩大业务,开始编印“文艺建设丛书”。《文艺报》第 1 卷第 12 期在向读者推荐“文艺建设丛书”时,特别指出:“自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及整风运动以后,很多革命青年知识分子,自觉地走上了直接为工农兵服务的岗位。八九年来,他们在这一个正确的方向上受到了锻炼,在长期的实际生活中得到了哺育。在文艺运动的发展中,也涌现了不少的工农兵作者。他们中间,有的过去爱好或从事文艺写作,有的现在才开始用文艺形式来表达自己所经历的各方面的生活和斗争。我们觉得这样的作品,在中国新文艺的建设上是值得重视的。由于他们缺乏和文艺及出版方面的经常联系,在写作过程或写出来以后,常常需要在整理、编辑、介绍出版各方面得到帮助。‘文艺建设丛书’的编行,就

① 叶圣陶:《解放前后的出版自由》,《新观察》第 18 期,1957 年 9 月 16 日。